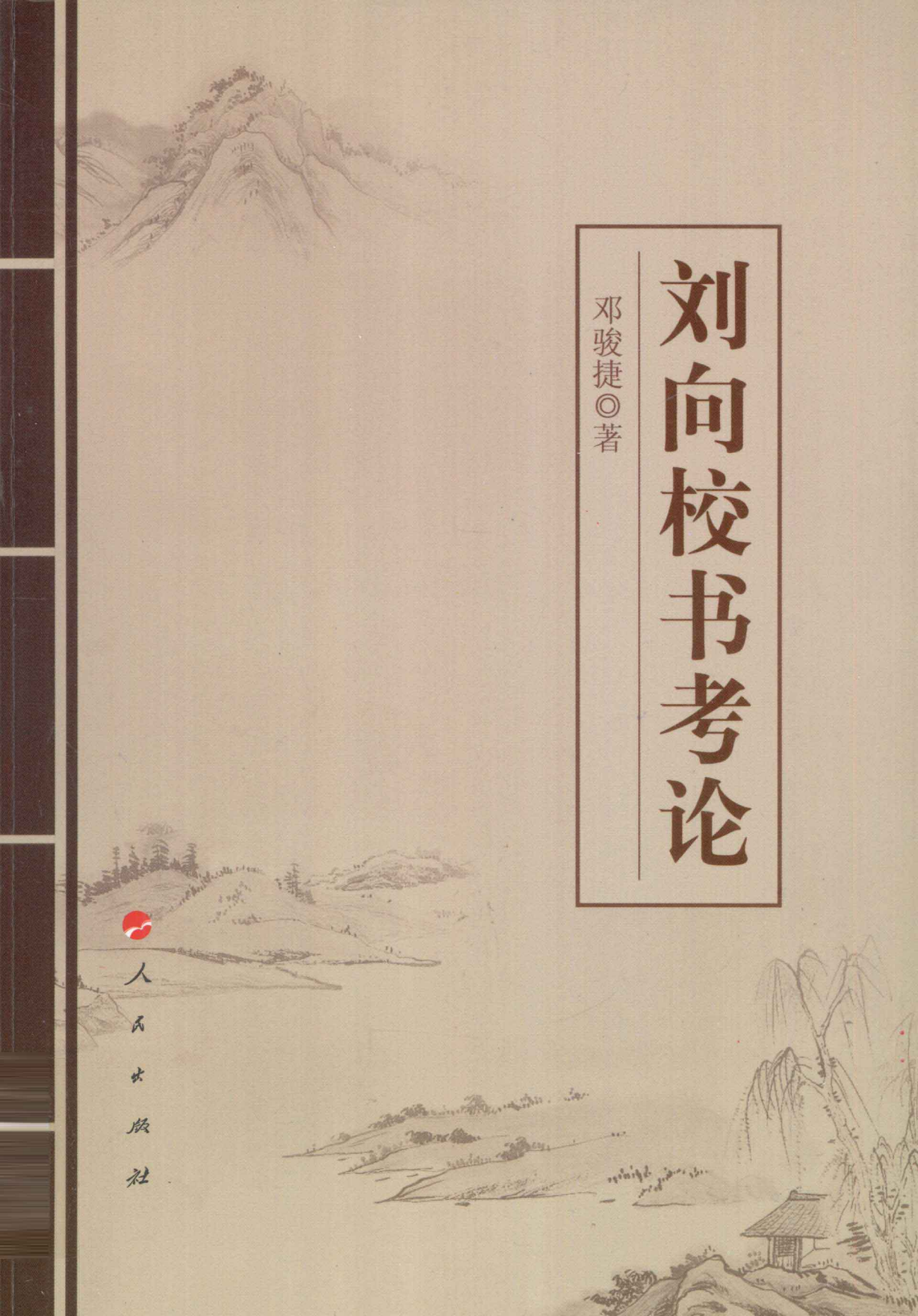




刘向校书考论

邓骏捷◎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刘向校书考论

邓骏捷◎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旭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向校书考论/邓骏捷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ISBN 978-7-01-011113-1

I. ①刘… II. ①邓… III. ①古籍整理—研究—中国—西汉时代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6868 号

刘向校书考论

LIUXIANG JIAOSHU KAOLUN

邓骏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5

字数:430 千字

ISBN 978-7-01-011113-1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本书由澳门大学资助出版



序 言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刘向、刘歆是一对不容易说清，也难以说尽的父子。

他们是西汉后期的博学大家，在经学、史学、诸子学以及文献学、天文律历等方面都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刘向于成帝时率领群儒典校汉朝“中秘”藏书，对先秦至西汉的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并在校书实践中初步建构了编纂、版本、校勘、目录、辨伪等学科的基础框架，在古代图书流传史和古文献学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刘向在校定诸书后撰写的众多“书录”（后来汇成《别录》一书），以及刘歆上奏哀帝的《七略》（主体保存于《汉书·艺文志》），开启了后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宝贵传统；又区分天下学术，论论各派得失，建立起一套新的学术体系和话语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东汉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意义殊为深远。

刘向校书活动取得巨大成就，且产生深远影响，学者历来推崇备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尚嫌不足的是，由于传统观念，也限于特定的时代条件，已有的成果往往集中在具体典籍考证的范围，较少结合西汉图书整理的传统对校书工作进行整体通盘思考。由于文献不足，各种史料又时相抵牾，所以刘氏校书过程中的若干史实至今仍然蒙昧不清，导致诸多见解不免粗疏、因循，甚至误读或过度阐释。另一方面，过往学者忽视校书活动中隐含的政治因素，以及对于向、歆父子意欲一统百家学术的理念缺乏贴合历史情境的

深入考虑，遂使某些重要问题及其意义隐而不彰。

有鉴于此，本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力图有所拓展，将刘向校书活动置于战国以来图书流传和学术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西汉后期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考察。首先，详细考析刘向的学术修养、政治思想和各种著述，以及校书活动的具体背景和政治动机，为下一步的论述提供可靠的文献和理论基础。其次，全面清查校书活动所经历的复杂曲折过程、校书工作中的操作流程和具体方法，尽量还原刘向校书的真实面貌。继而，深入讨论校书工作对于建构古文献学的意义、校书成果对于古代图书流传的作用，以阐明刘向校书在古文献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最后，从《七略》对先秦西汉学术的总结的角度展开论述，着重分析校书工作所反映的学术理念。

本书的写作遵循以下原则：（1）充分利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广泛参考相关研究著作（书后附有《刘向研究论著目录》，详列近代以来各类相关的图书、论文），严格遵守现代学术规范。（2）特别着重使用“二重证据法”，充分利用20世纪以来的出土简帛文献，推求刘向校书工作的若干细节，以及其对文献流传所产生的作用。同时，通过传世文献的查考和出土文献的对比，对刘向校书活动在古文献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3）发掘、开拓有关的文献史料，精细研考校书工作的成果（以《别录》、《七略》为主），重新还原刘向校书活动在学术文化史上的真相，并尽可能阐释其意义。（4）注重考虑刘向、刘歆的学术理念和政治倾向，为校书活动的研究增添新的视角。全书既注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考证，又强调学术分析和理论阐发，更加注意学术活动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解构，力图使此次史无前例的古籍整理活动，得到准确和深刻的揭示。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别录》、《七略》是研究刘向校书活动的基本文献，由于两书早佚，仅存有限的佚文，而且同一条材料往往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因此，为了保证行文论述的完整可读，有时难免会出现重复征引的情况。此外，为了节省篇幅和避免烦琐，本书引用古人著作，仅在首次出现时详列出版资料和页码，其后则只举书名、篇名（或卷数）。以上两点，敬请读者见谅鉴。

与向、歆父子“相处”10年，虽甘苦自知，却也乐此不疲。几经易稿，未必差强人意；但抛砖引玉，“献芹”讨教，以期得以长进，则万幸之至。

目 录

第一章 刘向的政治人生与学术实践	(1)
第一节 刘向的家族政治活动与个人政治表现	(3)
一、楚元王家族的盛衰起落	(3)
二、刘向俯仰浮沉的一生	(8)
第二节 刘向与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	(13)
一、崇尚经学的历史传统	(15)
二、学术追求的多元取向	(19)
三、以学辅主的政治色彩	(23)
第三节 刘向的忧患意识与学术实践	(26)
一、宗室观念对刘向的影响	(27)
二、刘向侈言灾异的实质	(31)
三、刘向的“以著述当谏书”	(36)
第二章 刘向著作考述	(41)
第一节 经部之属	(42)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五行传记》等三种	(42)
二、后人辑存经说两种（附：《刘向谶》）	(43)
三、后人误题经注、经说四种	(44)
第二节 史部之属	(46)
一、《列女传》等传世史籍四种	(46)

二、《别录》	(51)
三、续《史记》等二种（附：后人误题一种）	(76)
第三节 子部之属	(77)
一、《汉书·艺文志》所载《新序》等四种（附： 《百家》）	(77)
二、《五纪论》、《五纪说》	(85)
第四节 集部之属	(85)
一、刘向集	(85)
二、赋、文、诗	(86)
第三章 刘向领校群书综论（上）	(88)
第一节 背景与动机	(88)
一、先秦时期文献的产生与积累	(89)
二、秦至汉末典籍的聚散与增加	(94)
三、汉朝的求书、藏书与校书传统	(99)
四、汉成帝的个人因素与政治考虑	(107)
第二节 过程、阶段与地点	(115)
一、三次奉诏校书的过程	(116)
二、《七略》上奏的时间	(118)
三、王莽时期的校书活动	(126)
四、两个校书阶段的性质对比	(131)
五、天禄、石渠、温室	(133)
第四章 刘向领校群书综论（下）	(137)
第一节 规模与分工	(137)
一、空前规模的文献考查与古籍整理	(138)
二、合理统筹与细密分工	(142)
第二节 流程与方法	(155)
一、图书搜集与来源分辨	(156)
二、以中书为底本参校众书	(161)
三、定著篇章与书分内外	(164)

四、校雠文字与确定书名	(176)
五、撰作书录与缮写上奏	(195)
第五章 刘向校书与古代图书的编纂流传	(229)
第一节 刘向校本的整理模式	(229)
一、校定传本	(230)
二、新编别本	(237)
三、勒成新书	(242)
第二节 刘向校书与古书形态及流传方式的变化	(248)
一、古书形态及流传特点的成因	(248)
二、刘向校本与古书定本的流传	(252)
第六章 刘向校书对古文献学的建构与影响	(257)
第一节 古文献学框架的初步建立	(258)
一、版本学与校勘学	(259)
二、目录学与辨伪学	(269)
第二节 类分图书与学术总结	(283)
一、《七略》的部次群书	(285)
二、《七略》六经次第新议	(301)
三、刘向校书与先秦西汉学术的总结	(317)
第三节 刘向校书对古文献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347)
一、校书活动的创举意义与示范作用	(348)
二、目录学发展的启示作用与先导意义	(349)
附录 刘向研究论著目录	(355)
一、刘向著作	(355)
二、研究著作	(358)
三、研究论文	(359)
四、专书章节	(400)
后 记	(414)

第一章 刘向的政治人生与学术实践

刘向生于西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三月间，享年72岁^①；为楚元王刘交玄孙，休侯刘富曾孙，宗正刘辟疆孙，阳城侯刘德次子。^②刘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

① 刘向的生卒年异说甚多，所见者至少有5种，分别为：①生于昭帝元凤元年（前80），卒于成帝元延四年（前9）；②生于昭帝元凤二年（前79），卒于成帝绥和三年（前8）；③生于昭帝元凤三年（前78），卒于成帝绥和二年（前7）；④生于昭帝元凤四年（前77），卒于哀帝建平元年（前6）；⑤生于昭帝元凤二年（前79），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1年版，第1—2页；第52—55页）持第⑤说，亦最为可信。韩碧琴《刘向学述·第一章 刘向之生平暨其著述·第一节 刘向生卒考》（〔台北〕《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第29期，1985年，第4—9页）、李解民《刘氏校书考略》（载《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5—654页）、见氏著《刘向评传（附刘歆）·附录3 刘向生卒年考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511页）皆从之，且考证详细入微，毋庸再论。

② 刘向生平事迹主要见载于《汉书·楚元王传》，传中除首尾简略叙楚元王和其三世子孙，以及刘歆仕王莽以前事迹外，其余九成篇幅全以刘向为叙述对象。《汉书·楚元王传》叙楚元王至刘德事迹的文字，杨树达《汉书所据史料考》以为“盖亦向、歆父子之文。文出《续补史记》，或本之《自序》”（见氏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93页）。徐兴无则谓“《楚元王传》中的一些材料，可能出于楚王国的史记，或为刘氏家族所传，或为刘向歆父子校秘书时所见。可以想见，《史记》中的《楚元王世家》记楚国史事之所以简略，大概是因为太史公未见楚国的史记。所以，《楚元王传》不仅是一篇带有家族史性质的文字，而且有楚王国国史的依据”（徐兴无《刘向评传（附刘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值得重视。然今本《史记·楚元王世家》叙楚元王刘交至楚节王刘纯，散乱失次，又叙及宣帝地节年间事，故崔适谓“此篇残缺多矣”（见氏著《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页）。今考传末太史公曰有“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僂哉”之语，但传中只言“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

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②；于经学、史学、文学、文献学、天文律历等皆有极深的造诣，著述博杂宏丰，洵为西汉一代博学鸿儒。班固曾高度推崇其学术成就，以为“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乎！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③。刘向曾言“博学多识与凡殊”^④，可见他深明“博见强志”的重要性。刘向在生之时已有博学之名，连成帝也称“校尉（刘向）帝师傅，耆旧洽闻，亲事先帝，历见三世得失”^⑤，便是明证。东汉以后，刘向的博学广为学者文人所称颂，王充《论衡·超奇篇》云：“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⑥葛洪更谓“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经深涉远；思理则清澄真伪，研核有无”^⑦。唐宋以后更成典故，如黄庭坚《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中便有“博学似刘子政，清诗如孟浩然”之句。

在西汉学术文化史上，能够占一席之地的刘氏宗室，可谓屈指可数。武帝时有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武帝以后，当推刘向、刘歆父子。刘向幼承家学，研习经子史籍，精于辞赋；著《洪范五行传论》，发明天人之际；屡上奏议、封事，欲挽西汉皇朝于将倾；以著述当谏书，奏《列女

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而无一语及申公，足见司马迁原文已散失不全，而好事者又加以增入。此外，《汉书·成帝纪》、《礼乐志》、《郊祀志》、《五行志》、《艺文志》、《傅常郑甘陈段传·陈汤》、《萧望之传》等都有关于刘向的记述。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韩碧琴《刘向学述·第一章 刘向之生平暨其著述》、徐兴无《刘向评传（附刘歆）》对刘向生平事迹考证甚为详细，可资参考。

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3页。

③ 《汉书·楚元王传》。

④ 《文选·张平子〈西京赋〉》李注引刘向“七言”，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⑤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页。

⑥ 王充撰，王晖校释：《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6页。

⑦ 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

传》、《新序》、《说苑》，以化庸主。刘向非章句小儒，欲以道术匡扶西汉皇朝，故其学术活动往往与政治表现密不可分。然而，刘向在中国学术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成帝时率领群儒典校“中秘”图籍，对汉朝所藏的先秦至西汉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并在具体校书实践中建构了编纂、版本、校勘、目录、辨伪等学科的基础框架，于中国古代图书流传史和古文献学史上均有划时代的意义；所撰《别录》，开启后世与学术史紧密结合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影响深远。刘向能够在学术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家族及个人政治文化因素。

第一节 刘向的家族政治活动与个人政治表现

楚元王家族由刘交至刘向、刘歆父子，都与西汉各种政治活动息息相关，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兴衰荣辱，是众多同姓藩王中甚为特殊的一系。刘向身为宗室，自有别于其他民间学者的家族政治背景，一生仕途几度起落，周旋于宦官和外戚之间，人生命运及政治表现深受家族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又是整个家族政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一、楚元王家族的盛衰起落

汉高祖刘邦起于沛县，诛灭暴秦，力克西楚霸王项羽，一统天下，开创西汉皇朝。在楚汉之争期间，刘邦为争取同盟力量和笼络各地拥兵将领，曾先后分封若干人为王。刘邦登位后，正式定封爵，序为二等，分封了楚王韩信等7个异姓王，百余名功臣被封为侯。不久之后，异姓王相继发生叛乱，刘邦在诛灭异姓王的同时，分封了9个刘氏子弟为同姓王，用以屏藩汉室，并立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①，楚元王刘交便是9个同姓王之一。据《汉书·楚元王传》所载，“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灭秦后先被封为文信君，“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与刘邦的关系甚为密切。高祖六年（前201）十二月，刘邦会诸侯于陈，拘

^①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0页。

楚王韩信，分其地为荆、楚二国，封“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刘交在朝时曾参与内廷隐秘之谋，外出则封为占地3郡36县的藩王，“爱都彭城，以强淮西，为汉宗藩”^①，地位之特殊可想而知。刘交封王后多次入朝觐见和随高祖出游^②，对刘邦影响较大，因此《汉书·诸侯王表》首列楚元王，以示尊崇。楚元王对汉朝的影响可谓终其一生，甚至文帝在即位前亦宣称：“寡人不佞，不足以称，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弗敢当。”^③由此可见，在继承汉朝大统的问题上，楚元王的意见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文帝登位后，便立刻将“吕氏所夺齐、楚之地皆归之”，用以拉拢楚元王。

楚元王薨于文帝二年（前178），葬于彭城^④。因太子辟非先卒，汉文帝以当时已为宗正的次子上邳侯郢客嗣，是为楚夷王。由于“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及至“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執为宛胸侯、调为棘乐侯”，可见楚元王家族在汉主心中地位的尊贵。但盛极一时的楚元王家族，亦难逃“月盈则亏”的事物发展规律，后世经历两次重大的政治叛乱，家族几尽灭亡。

西汉之时，诸侯辖地非常广大，“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而且王国的“宫室百官同制京师”^⑤，中央政府虽派有太傅、丞相加以节制，但各诸侯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此种势力的存在不仅大大削弱了汉朝的力量，更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纷争，由刘交开创的楚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对抗角力的漩涡之中。楚夷王在立后“四年薨，子戊嗣”。楚王戊为人“淫暴”，又不礼中大夫穆生、白生、申公等儒生，穆生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参见《汉书·高帝纪》“九年春三月”、“九年冬十月”、“十年冬十月”的记载。

③ 《汉书·文帝纪》。

④ 最早记载楚元王墓的是《北征记》，其谓“（彭邑）城西有二十里有山，山阴有楚元王冢”（《后汉书·郡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获水又东迳同孝山北，山阴有楚元王冢，上圆下方，累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步许，径十余坟，悉结石也。”《文选》卷三六载有南朝宋傅亮《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郦道元所记或为重修之墓。现代考古调查表明，楚元王墓位于今徐州市西部的铜山县大彭镇，距市区约10公里的楚王山北麓，建在楚王山北侧与主峰相连的一座小山峰顶部。在墓的北侧，有两座高大的封土墓，在东侧约1,000米处，另有一座封土墓，应为楚元王刘交的后妃、太子辟非及功臣的墓葬。

⑤ 《汉书·诸侯王表》。

遂“谢病”而去。景帝三年（前154），楚王戊入京朝见天子，御史大夫晁错以其“为薄太后服私奸”为由，请求诛杀，景帝下诏赦免，但削去楚国的东海郡、薛郡。其后，景帝又以不同的罪名先后削去赵王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卬的6个县，展开了在晁错策动下的削藩之举。与景帝早有心病的吴王濞见汉朝不断下令削地，不久就要轮到吴国，于是串联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公开叛乱。楚王戊不听申公、白生以及休侯刘富的劝谏，“与吴通谋”；“削书到，遂应吴王反”，又杀害进谏的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率兵西向，楚元王子宛胸侯刘執亦参与其事。汉朝派大将周亚夫领兵平乱，大败吴、楚联军于昌邑，楚王戊自杀身亡。此为楚元王家族第一次公然背叛中央政府，而以刘戊兵败身死、刘執除籍为民告终。不过，景帝为了保存刘氏宗室，加上深念旧恩，再次“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这也是楚元王家族发展中的第一个转折点。楚元王第四子休侯刘富因不与楚王戊合谋叛乱而出走，投奔汉朝，楚元王家族从此分为中央任官和地方封王两支。

楚元王传子安王道，安王传子襄王注，襄王传子节王纯，节王传子延寿。在宣帝即位后，楚王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辅助之，故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又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并使何齐奉书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天下。”但遭何齐父长年上书告发，“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国除。”此为楚元王家族第二次背叛中央政府，宣帝唯有废除楚国的封号，地方封王一支基本上覆没^①。这是楚元王家族发展中的第二个转折点。楚元王家族由

^① 1980年以来，考古学界先后发掘了徐州附近的卧牛山西汉末代楚王刘纡陵墓、龟山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夫妇陵墓、东洞山楚王王后陵墓、北洞山西汉楚王陵墓、驮篮山西汉楚王夫妇陵墓、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调查了楚元王刘交陵墓群、南洞山楚王夫妇陵墓和桓山楚王后陵墓等。对于历代楚王陵墓的排葬规律、形制结构的演变、随葬品组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其中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被推定在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该墓虽然早年被盗，但内墓道中三个耳室和外墓道的陪葬墓幸未遭盗掘。主墓室内楚王入葬的玉棺、金缕玉衣虽遭扰乱，但除金缕外基本得以保存，同时墓内出土大量的玉器、金银器、铜器、印章、封泥和17万枚半两钱，另外还有兵马俑陪葬坑4座，充分显示出楚国特殊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徐州楚王墓的情况，详见李银德《徐州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的发现与收获》，载《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页。

显赫一时的藩王世家降而为阶下之囚，世事不可不谓无常；然而楚元王家族命不该绝，刘富承担起了绵延家族发展的大任。

当初，楚王戊不听刘富的劝谏，更扬言“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刘富惧怕受到牵连，“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后来刘戊谋反，刘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由于窦太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又因“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刘富及其子辟彊等四人遂得以俱仕于汉朝。刘富在楚王戊谋反时出奔京师，向朝廷表明与刘戊决非为一党，取得景帝的信任，再加上太夫人与窦太后的关系，刘富一脉才得以保存下来。在经历了险死还生的政治特变后，刘富及其子孙从受封藩王变为备受帝主猜嫌的宗室，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历经多次藩王作乱，武帝以后，刘氏宗亲已经很难成为汉朝天子的近侍重臣，出朝为官也不能典守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重地，诸侯王国之人一般也不得留仕于朝，汉朝对诸侯王甚至刘氏宗室防范得甚为严厉。为求能使家族赓续下去，刘富深知除对朝廷必须时刻表现出竭尽忠诚的态度之外，更需注意处事谨慎、兢兢业业、韬光养晦，以求存身避祸^①。刘富之子刘辟彊及孙刘德就是基于这种政治态度和处事策略，才得以逐步重新建立家族的地位。

武帝之时，刘辟彊“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有人向大将军霍光进言：“宜纳宗室。”霍光“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他人又进言其父刘辟彊尚在，亦为先帝宠臣。霍光“遂拜辟彊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据《汉书·楚元王传》的简略记载可知：刘辟彊虽然才智过人，为宗室之冠，但并无洋洋得意，反而谨言慎行，在政治上未有多大作为。

刘辟彊之子刘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因为其父刘德为宗正，得以徙大鸿胪丞，又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刘德“常

① 徐复观曾指出：“刘向的家世，一面是宗室懿亲，得到封王封侯及仕进上的优厚凭藉。同时，因两次叛逆的打击，也常在避远祸，居安思危之中。”见氏著《两汉思想史（卷三）·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52页。此说甚有启发，值得重视。

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盖长公主孙谭遮德自言，刘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屏居山田”。霍光得知甚为后悔，“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甘露三年（前51），匈奴单于来朝，标志着汉朝的中兴伟业已经完成。宣帝“思肱股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明著中兴辅佐，凡十一人，皆有传”，刘德位列第八^①。刘德是楚元王家族的中兴人物，他以过人的才智和韬略，深受武帝的赞赏和昭帝的重用；后来又参与霍光册立汉宣帝行动，以宗正的身份“至曾孙家（宣帝为武帝太子刘据之子）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并由太仆迎回宗正府^②。宣帝即位之后，刘德官爵日隆，政治地位渐见重要，大有恢复当年楚元王显赫之势的态势。

但是毕竟时移世易了，昭、宣两朝之时，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以霍光为首的外戚集团手里，刘德对此明若洞烛；加上楚王延寿的密谋被人揭发，导致自杀国除，为他带来无可避免的猜疑。因此，刘德唯有一方面继续父祖韬光养晦的政治态度，以老子“知足不辱”之计作为求存之道，既对外戚作有限度的合作，又有意制衡其势力。他不受霍光之女，除了“畏盛满”之外，也包含着不愿意与外戚集团结盟的因素。随后“责公主起居无状”实源于“公主为丁外人求封等事”^③，则牵制外戚的态度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为了抗衡外戚的势力，刘德大量起用宗室，宗族因他得官宿卫者竟多达20余人。此外，他为人又“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务求博取宗室族人的支持。刘德为保有家族的生存空间和刘汉的统治地位煞费思量，难怪他对次子刘向“铸伪黄金”这种莽撞行为甚是气愤，乃至“上书讼罪”，用心良苦又岂旁人所知。刘德薨后，“大鸿胪奏德讼子之罪，失大臣礼，不宜赐谥置嗣”，实非知人。唯宣帝能体会其行事用心，故制曰：“赐谥繆侯，

① 见《汉书·李广苏建传》。

② 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③ 王先谦《汉书补注·楚元王传》引周寿昌《汉书注补正》，中华书局影印虚受堂本，1983年版，第953页。

为置嗣。”

楚元王家族在西汉一朝举足轻重，先是位极人臣，中经两次叛乱，最后连封国亦被废除。刘富一系自入居京师以后，迫于政治现实，竭尽忠诚的为臣态度和韬光养晦的行事准则，一直奉行不怠；也正因如此，才能在风云变幻的斗争中屹立不倒，反而官爵日隆。这种家族特性对刘向影响深切，在其身上很容易发现这些渊源因素所起的作用。刘向于仕途虽不得意，三上三落，但一生时刻不忘为汉朝的大一统和长治久安出谋献策，尤其在与宦官、外戚的斗争中，极力维持刘氏的统治权威。然而，刘向少子刘歆却参与王莽篡汉之事，又与王莽联姻，更出任新朝国师，位极人臣。不过，刘歆及其子最后也因参与反新复汉的合谋，结果先后被害和自杀。历史可谓有情又无情，可悲又可叹。

二、刘向俯仰浮沉的一生

刘向一生仕途浮沉起落，大致可以划分为宣帝、元帝和成帝三个阶段。

刘向之所以能够参与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活动，主要得力于父亲刘德的荫庇及特殊的家族背景。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掾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曾因“献赋颂凡数十篇”，被宣帝置于左右。后来因献家藏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书》，“言黄金可成”，结果“费甚多，方不验”，吏劾“铸伪黄金，系当死”。若非兄长“安民上书，入国户半”，为之赎罪，宣帝“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刘向恐怕难逃一死，可见家族力量在危急之际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随后刘向受诏习《穀梁》，在石渠阁论经中表现出色，得以“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刘向官复原职，又加拔擢，被宣帝引以为亲信，可惜石渠阁会议后第二年，即黄龙元年（前49）十二月，宣帝便驾崩于未央宫。此一阶段，刘向正是少年得志，中间虽有起伏，但是凭藉家族学术修养的熏陶和政治势力的荫庇，逐步走向政治权力的核心。

元帝即位后，刘向进入仕途上的一个新阶段。宣帝临终前下诏令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太子少傅周堪共同辅政，又提升史高为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同时令三人并领尚书事。元帝初即位时，宦官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弘恭、石显